

从主办夜学到致力工运：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嬗变及其启示

周文斌 王鹏飞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1917—1923年是毛泽东世界观从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嬗变的关键阶段。这一过程中，他通过夜校实践观察社会底层，在工运斗争中深化阶级认知，最终完成从“教育救国者”到“革命领袖”的蜕变。其思想轨迹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成长规律，也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启示：唯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扎根群众、守正创新，才能在历史洪流中把握正确方向。深入研究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嬗变，对于培养立大志、明大德、担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工人运动；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嬗变

2020年1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强调，“必须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开启新征程，扬帆再出发”^[1]。重温毛泽东工运思想，将为新时代工运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历史启示。工人运动作为无产阶级觉醒的重要载体，其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的探索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社会革命的关键战场。当前学界对毛泽东工运思想的研究，多聚焦其成熟阶段的阶级斗争理论，却对早期思想转型的阶段性特征与实践逻辑关注不足。以1917—1923年为时间维度，工人夜校实践与工运斗争为核心线索，系统梳理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思想演进轨迹，剖析其认知深化与实践行动的互动关系。

一、教育救国的实践探索：改良主义的理想与困境（1917—1920）

（一）传统教育的突破与平民教育的萌芽

1. 早期思想底色：从儒家理想向改良主义的转向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蜕变，始于对传统教育体系的批判性继承。在湖南韶山冲那个宁静却闭塞的小山村里，少年毛泽东在传统私塾中苦读，《四书》《五经》的熏陶，在他心底悄然种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种子。1910年所作《七绝·呈父亲》一诗中“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誓言，正是这种入世情怀的集中体现。然而，当他在湘乡东山学堂读到郑观应《盛世危言》中“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的论断时，传统士大夫的治世

理想开始与近代改良思潮发生共振。这部系统批判科举制度、倡导“商战固本”的著作，首次将“废科举、兴学校、育新民”的改良路径清晰呈现，促使毛泽东形成“教育为强国之本”的认知框架。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激化了青年毛泽东的改良意识。他在《致湘生信》中痛斥“人心积弱，不克自振”，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这种“大本大源”的探寻，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中具象化为“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的教育主张，标志着其从个体修身向社会改造的思维跃迁。同年11月，他以师范学生身份创办工人夜校，在给校长的呈文中直言：“开办夜学，专为解决工人‘求知识’与‘谋改良’之双重困境。”这一行动绝非偶然，而是其改良主义思想的逻辑延伸——通过教育破除工农群众的“智识隔绝”，进而实现“人心革新”与“社会再造”。

2. 夜校实践：平民教育的创新实验

工人夜校的创办，是毛泽东突破传统教育范式的首次系统性实践。课程设置上，他摒弃了旧式学堂的经典诵读，构建起“实用知识+思想启蒙”的双重体系：国文课教授“工人”、“罢工”、“集会”等词汇，算术课结合工人工钱计算，时事课讲解“十月革命”“中国劳工状况”。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发起工人夜学，旨在通过教育启蒙工人阶级，解决工人“讲不得、写不得、算不得”的困境。现存的《夜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5年度湖南省工人运动史研究基地专项资助课题“毛泽东早期工运思想研究（1919—1927）”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5GYJD04。

作者简介：周文斌（1981—），女，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网络意识形态建设；

王鹏飞（2001—），男，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学日志》显示，毛泽东亲自设计的第一堂识字课，便以“工”、“人”、“劳”、“动”四字为核心，引申出“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尊贵”的观点，将文字教学与价值塑造融为一体。他还创造性地组织“工人谈话会”，让车夫、织工等分享生活困境，形成“课堂观察—问题收集—理论反哺”的闭环，使夜校成为解剖社会问题的“微型实验室”。

在教学方法上，毛泽东提出“先生学生共为一体”的平等理念。他要求担任教员的师范生“先做工人的学生，再做工人的先生”，自己则带头到岳麓山煤矿了解工人作息，将“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仅得二十文”等具体数据融入教案。这种“从群众中来”的实践，使夜校超越了单纯的扫盲功能。当工人在课堂上提出“为何洋人在中国土地上设厂”时，毛泽东顺势讲解“资本侵略”与“劳工联合”，初步构建起“教育—觉悟—组织”的改造链条。正如他1919年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所总结：“夜校之效，不在识得几字，而在唤醒其心底之自觉。”

3. 知识分子的角色重构：从“启蒙者”到“联结者”

夜校实践的深层价值，在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角色的重新定位。他在《夜学招学广告》中以“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的大白话开篇，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霸权。夜学广告以白话文书写，贴近工人实际需求，强调免费、夜间授课等便利条件，体现毛泽东早期“教育救国”的改良思想。在他看来，传统士大夫“君子远庖厨”的清高姿态，正是社会改良难以奏效的根源，因此提出“非融入工农，则改良无基”的论断。他要求师范生放下长衫、走进工棚，在与工人共同劳动中理解其疾苦，这种“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早期尝试，为后来党的群众路线埋下了实践伏笔。

1918年春，夜校学员参与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声援活动，毛泽东借机组织“劳工团结讨论会”，首次将课堂理论转化为集体行动。他在总结中指出：“士人若不能为工农代言，所谓改良不过纸上谈兵。”这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的再认识，不仅超越了维新派“开民智”的精英视角，更预示了中国革命“依靠谁、团结谁”的根本问题。

（二）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型的内在矛盾

1. 改良主义的现实困境：从自治运动到驱张实践的挫折

1919年主导的湖南自治运动，是毛泽东改良主义实践的巅峰，也是其思想转折的起点。他在《湖南改

造促成会发起宣言》中构想“湖南共和国”方案，主张通过“制定省宪、民选省长”实现“各省自治联邦建国”。这一设想本质上是梁启超“联省自治”思想的本土化实践，但其核心诉求——建设一个由湖南人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民主社会，仍局限于体制内改良。当军阀张敬尧武力镇压自治运动，赵恒惕上位后又将省宪沦为权力工具时，毛泽东痛切认识到：“在现有政治框架下修修补补，无异于与虎谋皮。”

同年12月参与的驱张运动，暴露出改良主义的另一致命缺陷。尽管他通过创办《湘江评论》发动舆论攻势，组织万人请愿团赴京抗争，但最终依赖的仍是吴佩孚等军阀的军事力量。运动胜利后，他在给友人信中坦言：“此次驱张，虽获小胜，然军阀根基未动，改良终属空想。”这种对“非暴力改良”的怀疑，为其转向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

2. 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与超越：从“呼声革命”到暴力革命的觉醒

1919年前后，《新青年》传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毛泽东产生过短暂影响。他在《学生之工作》中设想“新村计划”，主张通过建立“工读互助团”实现平等社会，这种“温和革命”的乌托邦构想，本质上是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中国化表达。然而，1920年春实地考察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让他意识到：“脱离社会根本改造的小范围试验，终会被现实碾碎。”

同年6月，驱张运动中目睹的军阀暴行——张敬尧部火烧学生联合会、枪杀请愿工人，彻底动摇了毛泽东对“和平改良”的信念。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疾呼：“历史证明，凡有压迫者，非以武力颠覆之，不能实现真正之平等。”这种认知转变，在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的信中达到顶点：“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3.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烛照：从零散认知到系统接受的飞跃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始于1918年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期间，他旁听李大钊《唯物史观》课程，阅读《庶民的胜利》等文章，首次知晓“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但此时的认知仍停留在“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的感性层面，直到1920年夏收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才获得系统的理论工具。他后来回忆：“这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后来能够背出来。阶级斗争学说，是我认识社会的金钥匙。”

1920年冬，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专门经

销《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马列著作，同时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系统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经验。这一时期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提纲，已初步运用阶级分析法划分社会群体，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的论断。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会议上，他明确反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主张“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标志着其世界观从改良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转变。

二、历史轨迹：从理论到实践的工运探索（1919—1923）

毛泽东早期工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革命从理论探索转向实践斗争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他通过早期工读互助实践、工人夜校的启蒙教育、工会组织的实际动员以及罢工斗争的实践经验，逐步构建了以阶级联合为核心、以工农联盟为根基的工运思想体系。

（一）早期毛泽东工读互助实践（1919—1920）

早在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是世界所有力量中最强的力量。^[2]随后他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的长文，对民众联合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像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事，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2]提出“小联合”与“大联合”的双重路径。文中特别指出，“工人的小联合”是“改造社会的杠杆”，需以经济斗争为起点，逐步过渡到政治斗争。这一思想体现了毛泽东对工人运动战略的初步设计，即通过基层群体的组织化逐步形成对抗旧势力的合力。

在1919年，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村”构想：以半工半读为基础，将家庭、学校、社会融为一体，通过“人人劳动、共同生活”的方式改造社会。1920年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后，居住在安义路63号（原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进行繁忙的社会活动^[3]。应彭璜之邀，与一师同学张文亮等一起试验工读生活，在上海民厚南里租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过着一种俭朴的生活^[4]。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他在上海民厚南里亲身体验工读生活，承担织袜、洗衣、送报等工作，试图以“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集体生活验证社会改良的可能性。

（二）工人夜校的创办（1920—1921）

毛泽东早期工运思想的起点，可追溯至其对工人

文化启蒙与阶级意识培养的实践探索。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创办了工人夜校，这一实践不仅体现了他对“教育救国”理念的延续，更标志着其工运思想从理论空想向实际组织的转变。夜校以识字教育和政治启蒙为核心，夜校课程不仅涵盖识字、算术等基础文化教育，还通过讲解社会不平等现象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逐步引导工人认识自身被剥削的阶级地位。通过教授基础文化知识，逐步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认为，工人只有摆脱文盲状态，才能理解自身受压迫的根源，进而形成阶级自觉。毛泽东在教学中结合《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内容，以通俗语言解释剩余价值理论，揭露资本家剥削的本质。这一实践不仅提升了工人的文化水平，更培养了其初步的阶级觉悟，为后续工运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一大的召开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1921—1922）

随着工人启蒙教育的推进，毛泽东的工运思想逐步转向组织化与政治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第一个决议，即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领导工人运动。各地区、各行业都应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是组织工会的一个准备步骤，要逐步变成工人组织的中心。学校最重要的方针，是唤醒工人们的觉悟，并启发他们组织工会。要求成立工会研究机构，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5]。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开始系统性地组织工人运动。湖南分部的成立标志着工运从分散的罢工抗议向有领导、有策略的阶级斗争转变。毛泽东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推动各地成立行业工会，并统一纳入全国工运网络。在长沙毛泽东采取“行业渗透、重点突破”策略，率先在水口山铅锌矿、粤汉铁路等产业工人集中区域建立工会组织。针对手工业者分散的特点，他提出“以行会改造行会”的创新路径，将传统行会中的封建师徒关系转化为现代工会的阶级联盟。

（四）指导泥木工人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实践活动（1922—1923）

1922年毛泽东指导工人成立“泥木工会”，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长沙土木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土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工会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当时已有会员一千零八十八人。通过制定《工会章程》将分散的6000余名个体工匠转化为有组织的阶级力量^[6]。在长沙泥木工人罢工

期间，毛泽东亲自起草《罢工宣言》，以“工价太低、生计困难”为突破口，将经济诉求与“反对军阀赵恒惕”的政治诉求巧妙结合^[4]。罢工胜利后，工会不仅争取到薪资提升，更迫使军阀政府颁布《湖南省暂行工会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承认工会合法性。这一突破性成果被邓中夏誉为“中国劳动立法史上的里程碑”。^[6]该实践验证了毛泽东“组织即力量”的论断，其创造的“经济斗争掩护政治斗争”模式，为后续全国性工运高潮奠定了基础。至1923年，湖南地区已建立23个行业工会，会员总数突破5.2万人，形成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工运中心^[7]。

1922年安源大罢工是毛泽东工运思想实践化的重要节点。毛泽东深入安源、水口山等工矿地区，通过建立工人俱乐部和夜校，将分散的工人群众组织起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不仅为工人提供文化教育，还通过集体谈判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权益。1922年9月，毛泽东与李立三、刘少奇共同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在罢工筹备阶段，他提出“哀而动人”的斗争策略，将经济诉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与政治口号（反对封建把头制）相结合，既动员了工人群众，又争取了社会同情。他主张通过工人俱乐部凝聚力量，并制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俱乐部合法地位”三大诉求，既明确斗争目标，又避免激化矛盾。罢工宣言中“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巧妙地将生存权诉求升华为人格尊严的政治主张，罢工最终迫使资方接受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成为早期工运的成功典范。

三、历史启示与当代价值：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嬗变的多维镜鉴

（一）立大志：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青年毛泽东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他早年便树立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志向，这份志向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于他一生的奋斗之中。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当代青年应当学习毛泽东这种志存高远的精神，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在清华大学考察时，他寄语青年“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要求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与毛泽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一脉相承。针对当下部分青年因信息爆炸而迷茫焦虑

的现状，拥有坚定理想信念至关重要。当青年明确了自己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力量的目标，便如同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灯塔，不会轻易被纷繁复杂的信息干扰。当代青年应学习毛泽东早年“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担当精神，积极投身于国家重点战略领域。

（二）明大德：在知行合一中锤炼过硬本领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展现出了强烈的务实精神。在工人夜校实践中，毛泽东要求教员“先做学生，再做先生”，深入工棚了解工人需求，将“工人为什么受苦”等现实问题融入课堂。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不仅是群众路线的雏形，更是务实精神的典范。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建立，通过“组织—教育—斗争”的完整链条，将分散的工人凝聚为革命力量，充分体现了“实干兴邦”的实践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2024年五四青年节寄语中，他要求青年“实学实干，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真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面对“内卷”与“躺平”这两种极端现象，务实精神是一剂良药。在学业上，当代青年若能像毛泽东深入调研一样扎实掌握专业知识，不做表面功夫，真正将知识学懂弄通，就不会陷入盲目跟风的“内卷”。当代青年应学习毛泽东“躬身入局”的实践态度，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增长才干。

（三）担大任：在风险挑战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毛泽东的世界观嬗变，本质上是一部在斗争中淬炼信仰的历史。从1919年“驱张运动”的改良尝试，到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火洗礼，他在失败中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最终完成从改良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这种斗争精神，为当代青年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精神指引。在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将经济斗争与政治诉求结合，展现出“敢于斗争”的革命勇气。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他痛定思痛，强调“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是失败主因，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这种在斗争中成长的经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的论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这既是对历史的回响，更是对未来的召唤。当代青年当以毛泽东为精神标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

绚丽之花。

四、结语

1917—1923年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从改良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阶段,其思想嬗变始终扎根实践:以工人夜校为载体的平民教育,打破传统精英教育边界,既实现对工人的文化启蒙与价值引导,也让他得以深入观察社会底层疾苦;随后通过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工作、领导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与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等实践,逐步深化对阶级本质的认知,完成从“教育救国”理想践行者到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身份转变。这一过程不仅清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实践中认知、在斗争中成长”的规律,更印证了“理论与实践结合、扎根人民群众”的真理。在当代重审这一思想发展轨迹,既是对革命先辈探索精神的历史传承,也为培养“立大志、明大德、担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讲话[J].人民日报,2020-11-25.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3] 胡为雄.青年毛泽东的教育梦(下)[J].毛泽东研究,2019(4):81—92.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5] 史兵.中国工人运动史话(第一册)[M].工人出版社,1985:50—51.
- [6]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76.
- [7] 湖南省总工会等编.湖南工运史料选编(第二册)[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484.